

钱

逊

论语浅解

北京古籍出版社

B2221/5
71384

中国古代文化要览小丛书

论 语 浅 解

钱 逊

北 京 古 籍 出 版 社

内 容 提 要

本书吸收历代学者对《论语》的研究成果，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对《论语》作最简要的注释，并附译文和简评。文字浅明，易懂。前言对孔子思想作了评述。

中国古代文化要览小丛书

论 语 浅 解

Lun yǔ Qiǎn jiě

钱 逊

北京古籍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马池口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开本 9.625印张 198,000字

1988年10月第1版 1988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7,400

ISBN 7—5300—0015—2/B·2

定 价：3.45元

0602/18
目 录

一、前 言	(1)
二、学而篇第一	(20)
三、为政篇第二	(33)
四、八佾篇第三	(51)
五、里仁篇第四	(67)
六、公冶长篇第五	(81)
七、雍也篇第六	(96)
八、述而篇第七	(112)
九、泰伯篇第八	(131)
十、子罕篇第九	(143)
十一、乡党篇第十	(159)
十二、先进篇第十一	(171)
十三、颜渊篇第十二	(186)
十四、子路篇第十三	(202)
十五、宪问篇第十四	(220)
十六、卫灵公篇第十五	(241)
十七、季氏篇第十六	(258)
十八、阳货篇第十七	(268)
十九、微子篇第十八	(282)
二十、子张篇第十九	(289)
二十一、尧曰篇第二十。	(301)

前 言

《论语》是记载我国伟大思想家孔子言行思想的一本书。它是在孔子死后，由孔子的弟子和再传弟子追记孔子的言行，编纂而成。其中也有一部分是记载了孔子弟子的言行。在古代，它是儒家的主要经典，今天，也是我们了解和研究孔子思想的主要材料。

孔子，名丘，字仲尼。生于公元前五五一年，死于公元前四七九年。孔子的先祖是殷商的王室。殷商灭亡时，受封到宋国，成了诸侯。以后历经变化，到孔子的曾祖孔防叔时，因宋国内部的动乱，迁居到鲁国，从此失去卿位，从贵族下降为士族家庭。孔子就生在鲁的陬邑（今山东曲阜）。

孔子的父亲叔梁纥，做过陬邑的长官，在孔子出世后不久就去世。孔子幼时的家境已经降到一般平民的境地。孔子自己说：“吾少也贱”（《论语·子罕》）。少年时他做过管仓库的“委吏”和主管放牧的“乘田”，都是地位很低的小吏。《论语·为政》里记载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三十岁以后，他就开始招收门徒，进行教育，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所私学。五十一岁时，孔子在鲁国做官，先后做过中都宰（中都的长官）、司空和大司寇（主管司法），但时间

不长，就因鲁国的动乱而离开了鲁国。以后他周游列国，到过卫、曹、宋、陈、蔡等国，向各国君主宣传自己的主张，但都没有被采用。六十八岁，又返回鲁国，从事教育。公元前四七九年死于鲁，年七十二岁。

孔子生活的时代，是中国从奴隶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社会大变动的年代^①。社会经济、政治的变动，也反映到思想上、文化上，在思想、文化领域引起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最主要的有两个方面：

第一，殷商和西周时期，学在官府，学校都由官府主办，并且只是为贵族子弟而设。到孔子时，由于经济、政治的变动，王室衰败，社会动乱，文化典籍流散民间，官学败坏，出现了文化下移的现象。孔子开设私学，招收门徒，就是文化下移的重要标志。

第二，从思想上看，社会的剧烈变动，动摇了殷商时期占统治地位的天命思想，“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小戴礼记·表记》）。一切都归之于天命，凡事取决于占卜。到西周，人们就开始对天命决定一切的思想产生了怀疑，开始从天命论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从天命之外去寻找对各种社会现象的解释和解决社会问题的药方。人们的思想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出现了一些新思想。

孔子正是在这样的环境、背景下从事活动，提出了他的思想。他不满于当时社会动荡的局面，以为是“天下无道”，一生致力于变“天下无道”为“天下有道”。他在学习和教育的

^① 关于当时社会变动的性质，历史学家们有不同的意见。但当时是处在社会大变动的时期则是无疑的。

过程中，对古代典籍文献作了许多搜集和整理工作，整理了《诗经》、《尚书》，删修了鲁国史官记载的史书《春秋》；同时，他也吸取了这一时期思想变动中出现的许多新思想，把那些零散的没有系统的思想加以总结，形成了有系统的思想体系。然后把这些传授给学生。他办学几十年，招收的学生据说达到三千人。这些学生有的出仕做官，有的招徒设教，发生了很大影响。到战国时期，韩非说：“世之显学，儒、墨也”（《韩非子·显学》）。儒墨的门徒已经“充满天下”（《吕览·有度》）。中间经过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成了以后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所以，在我国思想史上，孔子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是一个承前启后的人，对于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发展给予了极大的影响。

二

孔子生活在二千五百年前的春秋时期，他的思想在二千五百年后的今天，还能不能有现实的意义呢？儒家思想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曾经是统治思想，儒家创始人孔子的思想在今天的社会主义社会能不能有积极意义呢？

要回答这些问题，就要弄清楚传统思想中的普遍性因素的问题。就是说，在传统思想中，包含着某些具有普遍性的因素。所谓普遍性，包含了两方面的意义：一是从时间来说，它适用于历史发展的各个时代，不因时代的变迁而丧失其价值；一是从空间来说，它不局限于某一地域的某一民族，而可以为不同地域的不同民族所吸收、利用，对全人类

具有普遍意义。

传统思想中是否存在普遍性因素呢？这可以从几个方面去探讨。

人类的认识，一方面要认识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一方面要认识人自己的思想，同时也认识这两者的关系。对这两个方面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即世界观、认识论的问题，是人类认识的永恒的主题。人类在这些问题上的认识是一个逐步积累、不断发展的过程。每一时代的思想家都以前人的认识为自己认识的起点，在前人已经取得的认识的基础上前进，又为整个人类的认识增添新的真理的颗粒。这是一个连续不断、永无止境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任何一位思想家所提供的有价值的思想，只要是确实具有一定真理性的认识，尽管它还不完善、不深刻，或者甚至它还与谬误的认识交织在一起，这种具有真理性的认识，都构成整个人类认识的大厦中的一砖一瓦而具有永恒的、普遍的意义。

对于社会的认识稍有不同。人类社会是不断发展的。在不同时代，人们面临着极不相同的问题，人们总是立足于自己所生活的现实环境，针对现实面临的问题去认识社会，提出自己的各种认识和主张。正如古代思想家韩非所说的：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人们在不同社会环境下针对不同时代的具体问题而提出的这些认识和主张，在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发生了变化的时候，对于新的时代就不再适用。然而，在不同社会历史阶段之间，我们还是可以发现有一些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的普遍的问题，各个时代的具体问题，往往只是这种普遍性问题的特殊表现形式。因此，对于各个时代的

具体问题的认识和主张，往往也包含了对社会发展的普遍问题的认识。人们正是通过对各个时代的具体问题的认识和解决，逐步深入地认识和把握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所以，尽管各个时代所提出的问题和人们为解决这些问题所提出的思想是如何的不同，但在这些具体的特殊的认识中，却包含着普遍性的因素。

还有民族文化特点的问题。文化是不断发展的，没有一成不变的文化。但在各民族的历史发展中，总是会形成某些区别于其它民族的文化特点，在这种民族文化特点上所反映出来的民族性格或民族精神，是相对稳定的。尽管它也不断地改变着自己的内容和形式，但某些民族特点却一以贯之地保存下来，对这一民族的历史发展的全过程，具有普遍的意义。

文化思想中的普遍性因素并不是孤立地、以纯粹的形式存在的，它是和特殊性的思想联结在一起的，普遍性的因素存在于具体的思想之中，以特殊的形态表现出来。研究普遍性因素不能离开具体的、特殊的思想，而是要从特殊的具体的思想中找出其具有普遍性的因素，又与当代的特殊条件相结合。这样提出问题，我们在实际的研究中会看到，有的情况下，在封建性的糟粕中，也包含着某种值得继承的具有普遍性的因素。或者说，某些普遍性的因素正是存在于封建性的糟粕之中。因此，批判中有继承，继承也离不开批判和发展。这样提出问题和研究问题，也可以避免常见的把精华和糟粕割裂开来，讲批判就一笔抹杀，讲继承就全盘肯定的弊病。

三

孔子的基本思想是“为政以德”(《为政》)。他不满足于当时礼崩乐坏，天下无道的状况，一心要变天下无道为天下有道。他的全部言行都是为了这一目标。他认为，要使社会安定，根本的途径是进行道德教化，使百姓能自觉遵守“礼”所规定的社会秩序，这就是他的为政以德的思想。

最能表明孔子为政以德思想的是这样一段话：“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这里他提出了两种对立的治国思想：“道之以政，齐之以刑”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这正是春秋战国时期政治思想上的两种主要主张。这个问题的争论，构成了这一时期百家争鸣的最主要的内容。孔子在两种观点的对立中来阐明他的德治思想，实际上涉及到道德与政治的关系、道德的社会作用以及道德与法的不同特点等等重要问题，并作出了自己的回答。

孔子的基本出发点是：只有把政治统治建立在道德教化的基础上，才能使百姓有知耻之心，自觉从善，走上正道，(有耻且格)；而依靠法制、刑政，百姓虽然可以不做坏事，却不会有知耻之心(民免而无耻)。这是中国古代对于道德的作用以及道德与法制的不同特点的一个最早的，而且是基本正确的说明，对于中国以后伦理思想的发展和整个社会的发展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从这一点出发，孔子进一步说明礼与仁的关系，即社会秩序的政治规范与道德之间的关系。他说：“礼云礼云，玉

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阳货》）？“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离开了仁，离开了人的道德自觉，礼乐的规定，就只剩下了玉帛、钟鼓、流于形式。仁是内容、是灵魂，礼是形式。礼的巩固，要靠人的道德自觉来维持。另一方面，孔子又说：“克己复礼为仁”（《颜渊》）。仁的要求，又以礼为准绳。仁就是为了维护礼，道德的内容要适应政治规范的需要。仁和礼，道德和政治规范，就是这样紧密联系，互为表里，不可分割。

在德治的实施上，孔子重视对当政者的道德要求，认为当政者的“正己”是“正人”的先决条件。他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子路》）。“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子路》）？因此他重视“举贤才”，把这当作为政的重要问题（参看《子路·仲弓为季氏宰章》）。同时他重视教育、教化，提出了“庶、富、教”的为政方针，把教育看作施政的一个重要方面。甚至说：“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为政》）？把道德教化放到了首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地位。在孔子的德治思想里，政治、道德、教育三者不是互不相关的、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三位一体，构成维持社会秩序安定的一个统一的系统，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

孔子阐发了道德的特点和作用，同时他也夸大了道德的作用。他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颜渊》）？“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颜渊》）。在某种程度上，他把政治归结为道德教化，把政治道德化了。对现实力量的忽视，使他的德治思想不免成为不切实际的空

想，终于不为在位者所用。对法的忽视，也导向了人治思想。这在后来长期的封建社会里成为我国政治上的一个传统，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所以，从总体来看，孔子的德治思想并没有正确解决如何为政治国的问题。但不应该忽略，在这总体上不正确的思想中确实包含了许多合理的、具有普遍意义的认识。正因为这样，到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的德治思想又成为封建统治者治国的指导思想。不过这时已经是“以霸王道杂之”（《汉书·元帝纪》），吸取了法家的一些思想以补儒家的不足，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孔子思想的偏颇。而孔子思想中的合理部分则得到应用和发展，并且在封建社会的“长治久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其具体内容来看，封建礼教已经为时代的发展所否定，成为阻碍社会前进的绊脚石；从如何治国安邦的角度来看，孔子和儒家德治思想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所取得的成功，却可以对我们有所启迪。对于怎样把道德作为整个社会系统中的一个因素来认识道德的作用，怎样认识和处理道德与政治的关系等等，我们都可以从孔子的思想中吸取到许多有益的东西。

四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孔子对仁的内容的规定，也有其具体的特殊的方面和普遍性的方面。孔子答颜渊问仁说“克己复礼为仁”（《颜渊》），这个“礼”是具体的。在社会条件变化之后，后代的儒家，即使是最“正统”的儒家，也并不主张要按这个“礼”的要求去做了。有子说孝悌是仁的根本，这个

孝悌也是具体的，反映了当时的宗法制度的要求。这一些，都是在当时社会历史条件下“仁”的具体的特殊的内容。透过这些具体的时代内容，我们又可以看到仁还具有其普遍性的内容和意义。仁的学说，实际上是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普遍性问题：在社会中个人与他人的关系、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汉儒说“仁者相人偶”，相人偶就是讲人与人相处。仁的思想，立足于个人，但不把个人看作孤立的单个的个体，而是看成存在于社会集体中的一员。因此，人的一切言行，要顾及与他人、与社会的关系，要从处理好这种关系出发。

处理好人与人的关系，原则是“爱人”、是“忠恕”。忠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简言之，就是要推己及人。或者如中国普通人语言中所说的，将心比心，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这样做，也就体现了爱人。

从个人与他人的关系，进而推扩到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孔子提出了义利关系。要求人们“见利思义”。义者宜也。在孔子那里，合于仁、礼的为宜，见利思义也就是要求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要符合仁礼的要求。从它的具体的时代的内容说，这是要人们安贫乐道，服从奴隶制等级制的秩序，以维护这种等级制度的稳定；从普遍性的意义来说，则实质上是提出了处理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①关系的原则：以社会利益为上，个人利益服从于社会利益。孔子对此作了大量的说

① 这里讲的社会利益，是指维护一定社会秩序的安定的需要。在阶级社会里，这种利益就表现在统治阶级的利益上，在孔子的思想里，就表现为维护奴隶制等级制的要求或利益。

明，提出了三个层次的要求：

第一，“见利思义”。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里仁》）。“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述而》）。这是从消极限制的方面讲，以社会的利益来约束个人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孔子把这看作是一项基本的道德要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里仁》）。能否以个人利益服从于社会利益，是君子与小人的分界，不能做到这一点的人，是不足与议的。

第二，当仁不让，见义勇为。这是从积极提倡的方面讲，凡符合仁义要求的，于社会利益有利的，应该积极勇进，不可犹疑、退缩和回避。

第三，“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卫灵公》）。这是最高的境界。为了仁，为了社会利益的要求，应可以牺牲个人的一切，以至生命，而不能因个人求生而损害社会利益。这才是真正达到了仁的境界。

正是在这样的思想下，养成和发展了中华民族以天下为己任、大公无私的美德和为国家为民族坚贞不屈的崇高气节。“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自古人生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等等古代志士仁人流传千古的名言警句，共产党人“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豪言壮语，尽管它们所包含的具体内容有着极大的不同，却都渗透着我们民族的优秀传统精神。从这点来说，孔子仁的基本精神，历

经两千多年，并没有减损其光辉，相反，历代志士仁人的身体力行的光辉业绩，丰富、发展了它，不断赋与了它以新的生命力。

孔子关于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关系的思想，也有其严重的不足。他着重强调、发挥了个人服从于社会的一面，忽略了为了社会利益而发展个人的一面；强调了二者的矛盾、对立，忽略了二者的统一、和谐；强调了个人的义务，忽略了个人的权利。在儒家思想的后来的发展中，孔子思想中的这一缺陷就发展成了“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把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绝对对立起来，否定、抹煞了个人对物质利益的正当的追求和个人独立的精神价值。孔子和儒家思想的这一特点，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它反映了奴隶制和封建制的等级制度下人与人之间的依附关系，与西方启蒙运动时期资产阶级的人文主义思潮恰成鲜明的对比。在西方资产阶级的人文主义中，强调的正是人的天赋权利，以此来反对中世纪的专制统治。两种不同的思想，反映了不同的历史背景。看起来二者是互不相容的。然而这不同的思想又是对社会发展中的同一个问题作出的不同的回答。这两种思想既是互不相容的，在某种意义上又可以说是互补的。从具体的时代内容来说，二者是不相容的。而从对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这个问题的解决来看，则可以认为，这两种思想各反映了问题的一个侧面。孔子的思想阐发了个人作为社会集体的一分子的这一方面，西方人文主义思想则是着重阐发了个人作为独立主体的这个方面。而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的解决，正包括了这两个方面。从这点上看，这

二者又是互补的。人们将在这两种不同的文化思想的互补和融合中找到合理解决个人与社会关系问题的理想途径。在我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中，将批判地继承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所获得的全部优秀成果，使人们对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的认识达到一个新的飞跃，自觉地把个人和社会这两个方面正确地结合起来，以保证社会关系的和谐和个人的充分的发展。而社会主义和未来的共产主义制度，则将是这种思想得以实现的物质基础。

五

对于世界本原及其发展规律，即世界观方面的问题，孔子没有给以很大的注意，没有留下系统的论述。但这不是说他在这方面没有有价值的思想。孔子“敬鬼神而远之”，“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等等思想，表现出对鬼神的一种现实的理性的态度，对于中国的文化传统的形成发展有很重要的影响。而值得特别提出来加以介绍和说明的，是他的中庸思想。

关于中庸，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雍也》）！认为中庸是至德。实际上，中庸并不仅是一个道德的范畴，它实际上是反映了一种对客观事物发展规律的认识及由此而提出的处理问题的基本方法。孔子评论他的弟子说：“师也过，商也不及。”“过犹不及”（《先进》）。过犹不及就反映了对客观事物发展规律的一种认识，而由此得出的处理问题的基本要求，就是中庸，无过无不及。所以，中庸的中，并不是折中、调和，而是要适度。中庸也重视和，孔子弟子有子

说：“礼之用，和为贵”（《学而》）。而和，也是要适度，就是使两种对立的因素协调、配合得适度，使之达到统一、和谐的状态。孔子说：“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左传·昭公二十年》）。为政有宽猛两手，这两手不可偏执，也不可偏废，无论宽、猛，都要做到适度，无过无不及，才能使二者互相配合、补充，达到“和”的境地。《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节，也有适度的意思。

可见，中庸的基本思想是要掌握事物的度，由此又引申出正确掌握对立面的度，使对立的因素互相协调、补充，达到和谐的思想。诚然，孔子没有明确提出度、对立面的互补或对立面的统一等等范畴，也没有作出从事物的对立中来把握事物的明确的概括，但中庸思想中却确实包含了这样的宝贵的思想因素。而且，正是这样的思想渗透在孔子仁的思想中，构成为仁的思想基础。仁的出发点，正是要从人和他的对立物——他人的关系上来把握人；仁的思想，正是要求人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中把握好应有的度，使人与人的关系达到和谐。孔子要求“克己复礼”。这个礼，就是度的具体规定。因此可以说，仁也就是中庸的体现。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

中庸思想也有其不足。这就是孔子有见于和，无见于争。对立物的统一和斗争，是事物发展的规律，和谐固然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重要条件，斗争、竞争也是事物发展的动力，而孔子对这一点却没有认识。他说：“君子无所争”（《八